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中国金融市场 创新再论

许崇正 /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本书出版受华夏英才基金的支持

【 中国金融
市场创新再论 】

许崇正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金融市场创新再论 / 许崇正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12

ISBN 7 - 5005 - 8724 - 4

I. 中 ... II. 许 ... III. 金融市场 - 研究 - 中国 IV. F8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6771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涿州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960 毫米 16 开 24.5 印张 408 000 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涿州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 000 定价: 42.00 元

ISBN7 - 5005 - 8724 - 4 / F · 7584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许崇正，1952年10月生，安徽省庐江县人。经济学博士、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经济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跨世纪学科学术带头人、省国际金融经济学会会长、中国金融学常务理事，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兼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商学院名誉院长。1992年7月—1995年7月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5年2月前后—1995年8月在福建兴业银行总行信贷部任副总经理；1995年9月—1997年7月在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做首届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其间在广东发展银行总行规划部挂职实习6个月）；1997年7月—1998年4月在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资金计划处工作；1998年4月—1998年7月任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兼金融系主任、教授；1998年8月—2002年12月任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12月底—2003年7月任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商学院名誉院长、金融系主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8月至今任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兼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商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已公开出版金融学和经济学学术专著18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国家重点权威学术期刊、国家级核心学术刊物以及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60多篇。发表的论文曾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刊物、著作转载引用。1991年以来，先后主持国家科技部“863”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九五”科研重点项目、省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省科委项目等近20项，目前在研项目（正在完成的国家级项目和省部级项目）6项。先后获得重大优秀科研成果奖8项：其中省政府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项；省政府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项；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项；省教育厅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项；吉林大学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1项。

责任编辑：张立宪
装帧设计：海 东

前 言

我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已经有二十六年了，其中从事金融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1992年我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进入西北大学学习，师从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也就是说从1992年下半年起我转入了金融学的研究。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我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何炼成教授对我说，“你今后的博士论文就写金融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国家经济体制各方面正处于改革之中，目前金融业发展还很落后，但是金融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太重要，今后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我国金融业必须加快大发展，目前国内研究金融这方面的人还很少，金融人才缺乏，你就将三年博士专业方向确定为金融学吧，专门进行金融学研究，博士论文就写这方面的。你在伦理经济学研究方面有一定成就，但是国内目前经济学学术界对这一方面理解的人并不多，以后等时机成熟，再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吧。”何炼成导师的这席话，当时使我很惊讶，也感到束手无策。因为，在读博士之前10多年里我一直是在一家省委党校从事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并且，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伦理经济学”，在这一领域，我已发表了近10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当时全国第一本系统研究这一方面的学术专著——《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经济——伦理经济学引论》，在国内学术界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10多家报刊发表了评论。我读博士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三年博士

学习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研究，以取得更大突破。因此，当时听了何炼成教授这席话，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感到很意外，只好回答说：“请老师让我回去仔细想想，再给老师汇报答复。”从老师家回到学生宿舍后，我认真地思考了两天，最后我觉得何教授的话是很深刻的，很有道理的，国家目前急需金融学方面的高层次研究人才，自己在这方面是应该做些努力的，同时我的伦理经济学的研究属于理论经济学，属于规范经济学范围，更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各个主要方面，要想就这一学科、这一领域研究好，必须也必然要涉及市场经济的一些主要领域，而无疑金融领域是市场经济的最重要领域，从事这一学科领域研究是无法对金融领域回避的，我的《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经济——伦理经济学引论》一书虽已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价格机制、分配、税收、消费、需求、福利等作了系统探讨，但唯独缺少金融这一块。因为当时自己感到金融学太复杂、较深奥，因此放下来，忽略过去了。现在正好结合何炼成导师定的博士论文题目和范围，花几年时间对这一领域——金融学领域作一认真系统研究，为伦理经济学研究打下进一步的理论基础，拓宽研究范围。我想做学问本来就是扎扎实实、不畏艰辛的，要有科学态度的。想到这些，思想通了。两天后我给了导师正式答复：自己愿意从事金融学研究，将博士论文定在金融学方面。

这样一个答复，从1992年底起我的学术生涯，我的人生至此发生了一次很大的根本性转折，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伦理经济学的研究转向金融学研究，这一转折，到今天已经整整十四年了，也就是说，我从事金融学研究一晃已有十四年了。

博士期间研究方向定下来后，我就一头扎到图书馆和经济管理学院的资料室广泛查询阅读这方面国内外图书资料，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定要把国外、国内已有的金融学理论方面主要学术文献全找到看看，一定要进入国内外金融学学科的前沿进行学术探讨研究。从1992年底—1993年底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先主要是搜寻国内外金融学前沿文献，然后埋头读书。这一年多里，我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国外金融学文献和国内金融学学术文献，特别是国外刚刚出版不久的金融学方面的前沿学术文献，大约有700—800多种，有的我是精读，有的是快速阅读，也就是说在1992年底—1993年底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认真广泛阅读了700—800本书，这些书有的是古典经济学、金融学文献，也有不少是国外近几年刚刚发表、出版的金融学文献。

经过1992年下半年和1993年一年多时间的对国内外文献阅读和研究,1993年底我将博士论文提纲(目录)向我的博士生导师何炼成教授汇报,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金融市场创新论”,提纲交给何炼成教授后,何教授经认真阅读后跟我说:我对金融学专业研究不多,你去把博士论文提纲送给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请他给你指导下。遵照何炼成导师的嘱咐,第二天我就从西安赴北京。由于我上博士就是厉以宁教授推荐的,同时,以前关于伦理经济学研究方面就曾经经常就教、拜访、接触厉以宁教授,因此我们过去就很熟。这一次就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和提纲专程就教厉老师,厉以宁教授立即在百忙中(当时他任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作非常繁忙,重要会议非常多)安排时间在家中接待了我,认真阅读了我的博士论文提纲和我进行了较长时间交谈,对我的博士论文提纲做了细心指导,做了一些修改,给了我很多指教,使我受益非浅。从北京回到西安后,我按厉以宁教授审定修改后的提纲进一步查阅文献资料,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1995年2月我完成了2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金融市场创新论》,1995年4月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大约在1995年7月我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在答辩和评审中,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厉以宁教授,著名金融学家赵海宽教授,以及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傅殷才教授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厉以宁教授在评语中是这样写的:“本文探讨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者从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详实的资料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其政策建议部分可供有关部门参考。本文的明显优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作者讨论了金融市场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指出在近300年的时间内,金融市场理论经历了从早期金融自由到金融抑制,再从金融抑制到金融自由的螺旋式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性现象,并强调这是不可抗拒的趋势。作者根据这一思路,研究了中国金融市场的现状及其与市场经济要求的差距。这样,就能够在较高的层次上分析中国金融市场的体制创新,而且能使分析具有深度。第二,作者在分析中国金融市场创新时,从货币市场创新、证券市场创新、利率机制创新、金融中介机构创新等方面分别加以论述。范围相当广泛,但层次清晰、条理清楚,这是很难得的。这就能使读者了解中国金融市场体制创新的全貌,并知道这项改革的艰巨性。”

1995年4月中旬,我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后,1995年4月下旬我再次带着博士论文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的一些问题,来到福建兴业

银行总行报到，安排在福建兴业银行总行信贷部副总经理岗位上工作。在福建兴业银行总行信贷部的岗位上的近半年里，我的收获很大，对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中国的银行业的信贷和票据承兑贴现上存在的问题有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看法，特别是感到中国的资本形成问题，间接和直接融资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以及中国金融市场中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如何发挥，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如何完善，两个市场如何对接好，特别是资本市场、证券（包括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在中国资本形成中的地位 and 作用等等一系列问题，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带着这一系列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于1995年9月来到了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作为首届经济学博士后，做金融学方面深入研究。在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期间，我的博士后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资深经济学教授张维达。吉林大学博士后期间，我一方面就中国资本形成等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另一方面将我在西北大学的博士论文寄送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将我的博士论文大部分章节，分别寄送《中国社会科学》、《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中国城市金融》、《金融理论与实践》、《经济纵横》、《新金融》等刊物。值得欣慰的是，寄去的论文很快陆陆续续被这些有影响和权威性学术刊物全文发表。然而寄给中国金融出版社的博士论文书稿的出版却遇到了一点挫折。由于我的博士论文探讨的一系列问题都是中国金融改革正在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前沿学术问题，中国金融出版社内部发生分歧，大部分同志主张免费出版，个别负责同志由于不同意我论文中的一系列观点，不同意出版，这样，我的书稿在中国金融出版社被搁置了大半年时间，错过了最佳出版时机。后来中国金融出版社金融理论编辑部负责同志感到很内疚，决定按照有关规定，给我经济上赔偿，我拒绝了。中国金融出版社的两位正副主任出于对中国金融改革和理论研究发展趋势的洞察力，出于良好职业道德责任感以及出于对我初出茅庐的年青学者的支持，主动提出将我的书稿推荐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张立宪同志在阅读了我的书稿后，给予了赞扬和肯定，二话没说决定给予免费出版，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出版，从书稿转送去出版发行只用了二三个月时间。《中国金融市场创新论》一书出版后（该书是1996年7月出版的），当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很快该书就销售完了，因此该书出版后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下半年，该书责任编辑张立宪主任希望此书再版，但当时正值我博

士后研究报告即将完成阶段，同时也是我分配工作阶段。因此一方面因为无法顾及此事；另一方面因为想如果再版，自己必须增加许多新内容，起码1/3，否则再版无多大意义。因此就没有马上再版了。

在吉林大学博士后两年期间里我的收获是巨大的，这两年我在全国许多有影响、权威性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20多篇，获得了吉林大学优秀科研论文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与此同时，我一方面为研究探讨我博士后研究报告课题，对国内外前沿学术文献特别是国外前沿学术文献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另一方面我深入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哨的广东发展银行总行挂职实习、调研，了解中国金融改革实践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在我博士后出站前，我的博士后研究报告送交一批著名经济学家鉴定时，他们一致高度评价，认为有许多理论创新和新意；同时，研究报告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对中国金融深化改革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看法。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对我的博士后研究报告作鉴定评语时是这样评价的，“这份博士后研究报告是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国际上比较分析，以及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实证分析，是本报告的显著特征。报告中的一些论点很有新意：例如，作者指出：‘应建立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用社会主义资本范畴取代资金范畴’、‘证券化是解决中国资本短缺的惟一出路’、‘中国应大力发展短期金融债券’、‘国库券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操作工具’、‘中国既要发展封闭型基金，更要发展开放型基金’等论述，论据充分，有较大的说服力。这表明作者在吉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期间，在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在中国资本形成这一研究领域内处于国内前沿地位。”著名经济学家、资深经济学教授张维达对我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在成果鉴定上是这样评价的：“该研究报告的选题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前沿问题，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作者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把金融理论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实证分析，做出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研究报告对资本范畴和中国资本形成提出自己的颇有新意的独立见解。文中提出我国金融市场证券化、国库券应成为中国货币政策主要操作工具，按中国国情更应发展开放性基金等主张，论证充分，资料翔实，有说服力，具有较高水平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作者在吉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工作期间，面向实际，悉心毕力，发表20余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完成国内本领域处于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著名金融学家赵海宽教授是这样评价的：许崇正的《中国资本形成与资本市场发展论》研究报告，针对我

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资本形成过程存在的理论难点与实际问题的研究，研究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机制，是一部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创新深化的好著作。具体讲有以下特点：

1. 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对于我国这样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形成问题的研究是鲜为人见的。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批判地借鉴西方金融深化学派的理论并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期望创建以中国的资本形成范畴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形成理论和金融市场创新理论。作者选择资本形成的内外部机制问题即资本形成与金融市场关系问题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完善金融市场以促进中国资本形成涉及到了一系列当前中国金融市场深化中的前沿问题，研究成果有重大学术价值。

2. 注重理论创新。作者对一些熟知的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赋予新的内涵。如对资本及资本形成，作者认为资本是“商品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积累起来已取得价值增值的预付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本内涵中的无形预付价值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形成范畴则定义为“国民收入向资本的转化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资本形成是以金融形成的方式，通过市场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完成的”；完善的金融市场在资本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金融市场在世界范围内正经历着投资者与融资者突破金融中介的限制，再度走到一起面对面竞争的发展过程。证券化为资本的集中提供了有效便捷的方式，作者详尽分析了金融市场证券化的原因，我国资本形成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化与中国资本形成的关系，提出“证券化是解决中国资本短缺的惟一出路”，资本市场发展是国有企业脱困、实现国民经济战略性重组问题解决的关键。“大力发展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开放型基金”，加速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稳定资本市场，同时国家可通过对专门投资基金总量、投资方向、结构的间接调控以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的主张。

3. 提出了如何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思路。作者在第一章中将如何构建中国的直接融资体系，完善中国的金融市场的思路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然后对股市的健康发展、投资基金市场的运作、公开市场业务建设、证券市场与国际接轨和开放资本项目、信托业的发展，进行了具体阐述；预见了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七大潜在风险，并对此提出了防范化解的对策，为今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市场体系的构造提出正确主张。

4. 综合分析、视野开阔。作者以科学的方法为指导,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比较与逻辑推理兼用、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金融市场非均衡出发,对我国金融市场形成发展过程、金融市场理论的演进过程、国内外投资基金和信托业的发展过程等作了全面研究,视野开阔。

从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出站后,我带着博士后研究报告中需要继续研究探讨的问题,我再次来到中国改革开放和金融改革发展的前沿——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资金处和华夏银行总行任职调研。半年后来到了安徽大学,任经济学院院长兼金融系主任,在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期间,在从事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同时,我一方面将我在吉林大学的博士后研究报告进行修改;另一方面将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大部分章节分别寄送国内有影响、权威性的学术刊物,很快全国许多有影响、权威学术刊物陆续发表我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大部分章节。在安徽大学任经济学院院长兼金融系主任的近五年时间里,我共计在全国有影响、权威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60多篇有份量的金融学 and 经济学学术论文,先后出版了7本金融学学术专著。这一切主要是来源、得益于我在西北大学读博士期间和在吉林大学作博士后期间的刻苦钻研、潜心研究,特别是始终跟踪学术前沿,同时也得益于我先后深入到5家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任职调研,把对在商业银行的亲自感受和遇到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研究,再由理论研究解决中国金融改革、金融运行问题。当然,更是与何炼成、于光远、厉以宁、张维达几位恩师的指导教诲分不开,没有他们的指教,我就不可能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也就不可能在金融学、经济学学术殿堂中遨游,取得成就。我从内心深处,始终深深地感谢他们,永生不会忘记他们。

2001年5月我被南京师范大学聘为金融学特聘教授(长江学者),2002年底之后我正式到南京师范大学工作。江苏省是个经济发达省份,经济强省,同时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认真对江苏省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加以研究探讨,不仅对江苏省、对全国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此我经常去江苏省的苏南、苏北进行调研,写出许多篇有关汇率制度改革、证券市场发展、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险基金改革与入市以及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方面的学术论文。例如,就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与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关系问题,我多次到苏南农村和县镇调研,写了几篇关于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论文,一方面在权威性学术刊物发表,一方面去苏南常熟等地做学术报告,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指导苏南农村金融改革、农村商业银行的建立

发展以及全国农村金融改革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总结我从事金融理论研究十四年成绩和过程，我有以下几点体会和感触：

1. 我始终认为金融理论属于经济学的一部分，从事金融学的研究必须具备经济学的功底，把经济学基础打牢。

2. 学术研究必须立足于学术观点的创新，学术研究的目标必须定在学术创新上。

3. 马克思经济学中有许多精华部分，这些精华部分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指导我们进行经济学研究重要指导思想。同样，也是指导我们进行金融理论研究和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例如，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关于银行、证券，关于社会供求、竞争，关于社会总资本，关于资本循环、周转，关于总资本再生产，以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等等，这一系列论述和思想无疑都是人类精华，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例如，我曾经在 20 年前以及 2001 年，分别发表论文论述过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对西方经济学的六个方面的重大理论超越。我自己十四年来对金融理论研究和取得的成绩正是得益于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精华思想的指导，得益于年青时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钻研，得益于对《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钻研。

4. 西方经济学和西方金融学理论研究中流派很多，观点纷繁，有的学派有许多科学的、先进的理论和观点，但也有的学派是在假设前提下产生的，还有的学派是在落后思想下产生的。我们应该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既学习、借鉴、包容，更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金融业改革的实践，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有选择地加以批判和吸收。同时，这种学习、吸收不是照抄、照搬，而是要有自己的学术创新，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这才是做学问的态度。

5. 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中有成就、有贡献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一些数学模型和数理方法的应用，基本上是在一定的学术思想观点、一定的学术理论创新下的学术运用，例如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弗里德曼、威廉、夏普和马可维茨等。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中数理研究方法是应该加以学习借鉴，但不是庸俗地滥用，而是应该在自己已有的一定的学术思想，

特别是自己已有的学术理论创新和学术思维创新下的应用。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经济学理论和金融学理论的发展，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发展作出贡献。从而才能起到指导中国不断深化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的作用。

6. 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结合。从事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的研究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断地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不断地在实践中吸收养分。在调查研究和实践中发现问题，带着这些新问题上升到理论加以研究，才能对中国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发展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有针对性、前瞻性、创造性。

由上面的五点感触和体会，进一步引起我想对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未来的发展谈谈四点思考。这四点思考曾分别发表在《学术月刊》、《经济评论》2005年第8期和第2期上，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论述一下，以作为我这本书的前言重要补充和重要内容，对此，我觉得是十分必要的。

我的四点思考是从重温亚当·斯密的著作引发的。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从亚当·斯密开始才真正建立了经济学，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部分，是从国际贸易学理论上发展起来的、分化发展来的，毫无疑问从属于经济学大学科。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未来的发展的思考与对中国金融学未来的发展的思考是一致的，共性的方面多于不共性的方面，但在这里我主要是谈共性的方面。

重温和研究亚当·斯密理论，使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伦理学家、法学家、社会科学家。亚当·斯密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正是这一完整的科学体系，使亚当·斯密创立了经济学说，经历300年后仍然光芒四射，始终成为世界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明灯。亚当·斯密的理论，对当今世界经济学的发展仍然在起着巨大的不可动摇的作用。当前深入研究亚当·斯密的学说无疑不仅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我国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未来发展更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学包括金融学研究水平和成果与西方的经济学界包括金融学界的研究水平差距是十分大的，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如何在世界经济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早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中国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和学者们关注、关心的大问题。我认为，当前深入研究亚当·斯密的理论（学说），将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给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未来发展很多启示。

1. 中国的经济学和金融学首先应该是伦理的经济学和金融学。过去在

人们心目中，亚当·斯密只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想到他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哲学”的思想家。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伦理经济具有方法论的功能。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在建构自己的经济学体系的时候，都渗透着各自的伦理经济思想。这是因为，在多种经济体系的背后，都隐藏着（潜伏着）更为根本的因素，即主要是经济学家的哲学和方法论指导，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决定着多种经济体系的本质和动态。比如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风靡欧洲思想界的“人性自私论”和自由主义哲学，导致了经济领域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自由发展的古典经济学。就经济学说史上的巨匠、杰出的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的本人来说，正是一位将伦理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他早年从事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中年转向经济学研究，晚年后又继续进行伦理学的研究，他始终将他的伦理学思想融合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才写出了杰出的、至今还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经济学和我们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名著《国富论》，推动世界各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

也就是说，研究亚当·斯密的思想 and 学说体系，我们不难看出，亚当·斯密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思想的发挥。经济学和伦理学，按照亚当·斯密时代英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属“道德哲学”这一学科，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谈到人的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惟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润为惟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亚当·斯密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只是论述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

论》和《国富论》中，从利己主义伦理原则来说明“经济人”的活动，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经济与伦理的结合，是通过神奇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公平的承担者的“纽带”联结的。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在亚当·斯密看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经济达到“自然平衡”。同时，它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平衡。亚当·斯密通过互利交换的现实，来阐明其观点。社会法规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表现，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处、各得其所。

总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亚当·斯密所说的道德有两重含义，一是由于利己心所引导的经济活动的世界是“道德”的世界；二是正义的情感或共同体所引导的人类行为的世界也是“道德”的世界。社会科学首先必须是“人”的学问，没有人的学问，没有“人”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而“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必须在社会中才能生存，这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如果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离开人的存在和立场而去分析经济和金融问题，肯定是极其片面的。亚当·斯密也好，马克思也好，他们都始终从人与社会的关联出发去分析问题，而且其目的也同样是为一代新兴的阶层的解放和发展。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其意图是为了谋求18世纪新兴的“平民”阶层的解放和发展，是构思“18世纪的新人”与社会的新的结构。亚当·斯密把市民社会里的近代的“经济人”的行为，置于广义的“道德”的世界，纳入他们的“道德哲学思想”之内，成为他的社会科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社会科学始终必须要以“人”为对象，以人的社会行为为对象来进行分析，同时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发展。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的两种属性是有机统一的，这就是经济中的利己主义和伦理学中的利他主义。亚当·斯密把人的利己心和同情心（利他心）的关系比做时钟上的长针和短针或文法与修辞的关系。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是“慎重之德”、“仁爱之德”、“正义之德”这三种品德统一于一身的人的理想模式。“慎重之德”是为了个人自己的幸福，正义与仁爱之德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这些具有利己心的人，只有在遵守社会正义的条件下，

才能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增进社会利益。亚当·斯密写道：“这些人的成功几乎经常要决定于他们邻人和同行们对他们的爱护和好评。因此，如果没有相当认真的行为，是不可能获得结果的。”这就是说，亚当·斯密认为，人们要照顾自己的利益，要爱护好自己，“利己心” = “自爱心”，普通庶民生活的动力也是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组成社会关系的主导契机。至于“利他心”，也就是一种“怜悯”，亚当·斯密把“利己心” = “自爱心”与“利他心” = “怜悯”的关系比之为“文法与修辞法”的关系。

因此，我认为，所谓政治经济学（或称经济学），就是人们以一定的伦理道德观念分析评判、制约和指导人们的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金融活动、经济运行以及金融运行。我认为它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指经济学家、金融学家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又是直接产生于他们各自对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中的道德观念的理解，以此来研究、探讨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行为、经济运行、金融运行、金融行为、资源配置如何适应和满足人们的欲望以及如何适应和促进人们的不断发展。第二，是指我们对这种指导经济行为的道德观念的认识和评价系统（即伦理经济观）。第三，是指人们如何应用这种符合经济行为和金融行为规律，不断促进人的发展的伦理，去指导经济行为，指导经济和金融运行，指导经济生活和金融活动。

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和经济学说还告诉我们：“经济人”的活动必须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任何社会的商品生产者的经济行为都必须有其内在的道德规范。特别是在经济学研究的高层次上，即在研究经济运行、金融运行、管理体制和经济金融发展目标之上，应该存在着一个对人的研究领域。如果说在研究经济运行、金融运行、管理体制和经济金融发展目标这一层次上已经不能回避人的问题，不能不涉及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伦理学原理的话，那么在这个更高层次上，几乎所要探讨的每一个问题，都是经济学研究、金融学研究与伦理标准相合的问题。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和金融学应该是伦理的经济学和金融学，这既是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继承，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2. 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应该是社会科学和历史的科学。根据已有的资料和文献，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亚当·斯密是一个建立有博大精深的社会科学体系的社会科学家，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决定了亚当·斯密成为了举世公